

FEI XIAO TONG MINZU
YANJIU WENJI XINBIAN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下卷 (1985-2003)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 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下 卷
(1985 - 200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 费孝通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1108-288-8

I. 费... II. 费... III. ①民族学—中国—文集 ②少数民族—研究—中国—文集 IV.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4496 号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下卷)

作 者 费孝通

责任编辑 满福玺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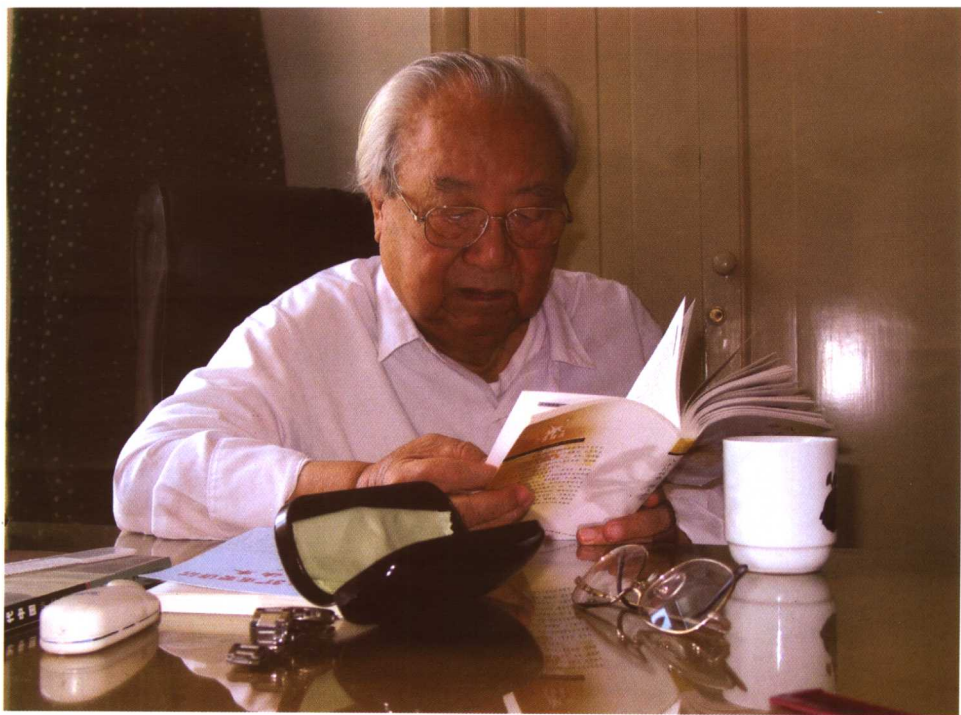
字 数 46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288-8/K·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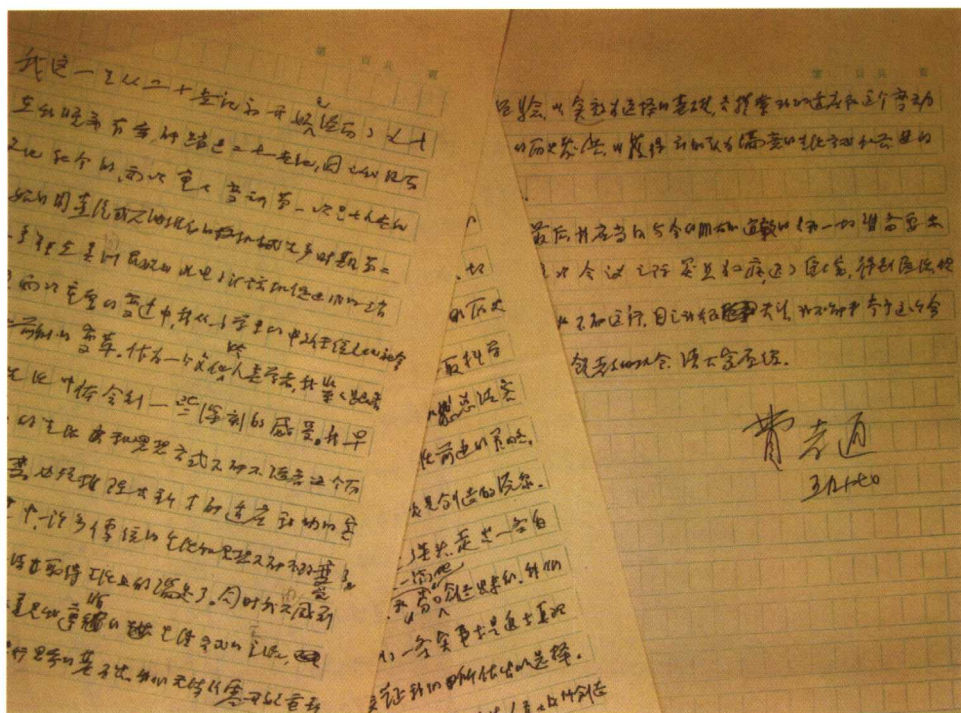
定 价 96.00 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费孝通

2002年7月6日徐平拍摄



费孝通先生手稿，写于2000年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原文见《费孝通文集》第15卷

目 录

1. 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	
(1985年1月30日)	(1)
2. 潘光旦先生关于畚族历史问题的设想 (1985年6月)	(5)
3. 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 (1985年6月7日至11日)	(10)
4. 包头篇 (1985年6月15日)	(17)
5. 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1985年6月)	(33)
6. 人口与开放 (1985年7月)	(40)
7. 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 (1985年8月16日)	(42)
8. 定西篇 (1985年8月28日)	(51)
9. 甘南篇 (1985年9月25日)	(68)
10. 民族调查工作不能脱离实际 (1986年1月25日)	(90)
11. 瑶山调查五十年 (1986年5月)	(96)
12. 谈缩小差距 (1986年6月)	(105)
13. 谈“民族” (1986年6月)	(109)
14. 贫困与脱贫 (1986年8月4日)	(113)
15. 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 (1986年8月13日) ...	(124)
16. 对民族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1986年12月24日) ...	(140)
17. 海南行 (1987年3月)	(148)
18. 发挥民族优势 开拓民族经济 (1987年4月11日) ...	(163)
19. 《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 (1987年5月4日)	(168)
20.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 (1987年5月18日)	(170)
21. 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的若干思考 (1987年7月)	(178)
22. 临夏行 (1987年10月)	(185)

23. 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的发展
(1987年12月7日) (197)
24. 海东行(1987年12月) (201)
25. 话说呼伦贝尔森林(1988年4月) (208)
26. 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1988年5月9日) (220)
27. 访骆驼之乡(1988年7月18日) (228)
28. 发挥民族优势脱贫致富(1988年7月23日) (238)
29.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8年8月22日) (244)
30. 保安三庄(1988年9月) (282)
31. 南岭行(1989年1月) (284)
32. 答问发展与发展研究(1989年4月11日) (292)
33. 四年思路回顾(1989年4月14日) (300)
34. 甘肃行(1989年12月) (338)
35. 开发大西北(1990年5月7日) (354)
36. 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1990年5月17日) (361)
37. 包头行(1991年1月16日) (366)
38. 凉山行(1991年6月) (374)
39. 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1991年8月) (387)
40. 武陵行(1991年12月21日) (391)
41.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1992年7月16日) (409)
42.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1992年10月1日) (427)
43.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
自我思考(1993年7月24日) (436)
44. 中央民族访问团追记(1994年2月) (459)
45.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
的再回顾(1995年1月1日) (463)
46. 三访赤峰(1995年7月25日) (485)

47. 毕节行 (1995 年 8 月)	(501)
48.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1996 年 8 月 20 日)	(509)
49. 小民族 大家庭 (1999 年 11 月)	(526)
50. “兴边富民行动” 好 (2000 年 1 月)	(531)
51. 积极拥护、支持西部开发大战略 (2000 年 6 月 17 日)	(534)
52. 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 (2000 年 6 月)	(540)
53.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2000 年 7 月 28 日)	(548)
54. 故地重游多新见 (2000 年 9 月)	(562)
55. 民族生存与发展 (2001 年 7 月)	(571)
56. 又一次访问定西 (2003 年 9 月)	(579)
后记	(591)

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

今天能在北京参加内蒙古地区的发展战略座谈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重点即将转移到边远地区来。

几年来，跟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我们的研究工作从农村开始，然后进入小城镇，从小城镇的发展中看到了它对中等城市的依托，因此有必要研究以中等城市为中心的一个区域的发展。研究工作也是从基层开始，更上一层楼，提出了区域发展的问題。

就我国整个发展形势看，全国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地区，沿海是我国的黄金海岸工业区，内地是大粮仓，边区是工业资源宝地。对如何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的战略研究，应注意地区间的差别的协作。

我过去是研究民族问题的，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对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别关心。我认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如不能共同繁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这在西方国家已经发生了，那里的土著民族濒于灭亡，美洲的印第安人成了旅游参观的对象，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国历史上一向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工作就是要实现共同繁荣和民族平等，出现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民族团结局面。团结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民族矛盾的产生根本出于经济的原因。我们想从内蒙古入手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民族大家庭，而不是片面地追求某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

去年我到甘肃省定西地区考察后，提出了一个十六字方针，即“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我们的黄金

海岸有如东亚的四个“小老虎”（台湾、新加坡、南朝鲜、香港），还有一个现在已成“大老虎”的日本。它们都是靠智力发展起来的，本身资源缺乏。它们看起来很繁荣但没有后劲，而我们的黄金海岸拥有极大的优势，既有肚子（指内地粮仓）、又有屁股（指边区资源），只要协作搞好，不但是老虎，还是一头大狮子，从远景看是一片光明。我们要从大背景着眼来设想很多问题，提出战略方针，但做事要脚踏实地，饭要一口口地吃。

内蒙古地形有如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雕，从经济结构上大体概括为“南农北牧东林西铁”八个字。在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在承德搞民族上层统一战线的历史事实启发下，我决定从赤峰地区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

通过赤峰的实地考察，纠正了我过去许多不正确看法，了解到这里历史上有过两种文化，概略地说，春秋战国前曾是林木茂盛的农业地区，而辽、金、元、清初则是游牧地区。辽代时相当兴盛，辽上京、中京皆建都于这一带。各民族南北往来就在这里进行。情况逐步发生着变化，到了清朝后期经济上的农牧矛盾引起了民族矛盾。感情一定有它的物质基础。矛盾都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发生的。粗放的五谷农业无疑会破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农牧矛盾如何转变为农牧结合，这是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搞农业不合算的地方要退农还牧，以农养牧，把牧业提高到现代化水平，搞建设牧业。农牧协作搞好了，民族矛盾也就解决了，势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新局面，在赤峰已经有了很好的事例。

第二个问题是在文化落后地区知识如何能传递下去，使之变成生产力。我们在驿马吐科技村调查中，总结了通过五级梯队把科技知识传到农民手中的经验。这里信息传递主要是靠口口相传，眼眼相看，而不是通过文字。我前年在加拿大看到一个大农

场，一个 40 多岁的农民独自经营 1000 英亩的农田。他靠机械生产，知识的更新靠看杂志，使用机器的技术靠说明书。两个例子对照一下，清楚地反映了文化程度对科技传递的影响，差别是那么鲜明。不过驿马吐的经验很重要，他们是从现有智力出发，做到了把科技知识传递到农民手中。从中可以总结出在现实条件下把科学知识合理有效地传递下去的组织和方式。驿马吐村的干部也从实践中懂得了普及初中文化的迫切性。这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由此赤峰市和翁牛特旗都在研究一个切合实际需要的各级人才的培训规划。

第三个问题我准备到包钢去考察一下在经济上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发展大的现代企业会发生什么问题。一是它对周围的影响，二是周围社会环境的反馈。建设包钢这样一个大企业，国家在人力、智力、财力上花了很大力量，至今技术力量并不薄弱。但我们不能只研究一个企业的效益，还要看这个企业带来的整个社会效益和社会环境的反馈作用。譬如说现在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包钢包了钢还包了人，人口泄不出去，包下来的人口使生产率上不去。所以我们搞企业要有社会经济区域发展的观点，总结包钢的经验教训，为今后边远地区开发建设大矿区、大企业做区域发展的规划提供经验。

类似的情况还有，如三线工程建成了封闭式的小社会，与外界无来往，企业本身之外仍是一片荒凉，这不是发展边区的方针，我们要有意识地搞开放式的企业。如日本的大企业把部件生产分散到无数家庭工场、小工厂去，自己成为一个经营和装配中心。我们为什么不能使千家万户靠国家的力量，搞有分有合有系统的社会主义组织，从家庭到大工厂，形成多层次的台阶。这是个城乡结合，城乡联系的台阶。

现在，我们正面临一场经济体制的大改革。通过改革和建设一定要做到农牧结合、城乡结合，筑成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任何西方国家所没有过而且做不到的。边区有丰富的资源，内蒙古可以从采掘工业、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入手，走出一条边区开发的道路来。

商品经济发展了，东西差距会拉大，这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的。我们不能要求发达地区等一等，只能针对这个问题采取措施，使边区迅速赶上去。在这里不可忽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吸收发达地区智力、财力、劳力的支援。

我还有5年就80岁了，还希望能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带出一批人来。这几年的实际经验说明，研究工作的依靠力量不是哪几个研究所或几个研究人员，而是要依靠能联系群众，有实际经验的实际工作者、政策研究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的结合。我自己懂得很少，但愿做一个忠实的“二传手”，把群众的经验总结出来，传递到更多的人手中，以促进和加速我们的四化建设。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同心协力，为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密切合作，团结一致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民族大家庭而奋斗。

1985年1月30日

潘光旦先生关于畬族历史问题的设想

1981年12月，我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座谈会上，讲过潘先生对苗、瑶、畬民族关系的一段设想。这段设想的酝酿，始于潘先生和我一起在1952年调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后和195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

座谈会上凭我的记忆总括了潘先生的这段设想，即“我们可以从徐、舒、畬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块地区被居民称作舒。潘先生从瑶、畬的槃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畬，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

这篇讲话发表后，曾引起了不少关心东南一带少数民族问题的朋友们的注意。我感到不太放心，因为这段设想是全凭我的记忆复述的，所以一直有意找潘先生的著作校核一下。

施联朱同志送来了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4辑，其中有潘先生所写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我又读了一遍，其中对苗、瑶、畬的历史有几段话。不妨抄录如下：

“辰沅以北，亦即洞庭湖以西……两千余年以来，各民族成

分的部位或分布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动；拿这两千多年的首尾比较着看，瑶族是更向南方移动了，部分进入了广西，与瑶族有密切关系的苗族则向北进展了些，越过了辰沅以北。”

“长江中游沿岸，特别是南岸，在六朝隋唐年间称为‘莫徭’的一个族类，在周秦以降中原族类历次向南伸进的压力之下，退却了，分散了；南下的一群成了今日的瑶人，在过程中省去了一个‘莫’字音，其中很早就进入东南的一支后来称畬瑶，或单称畬；向西与西南移动的一群成为今日的苗人，过程中把‘莫徭’的两字音切成‘苗’的一字音；其少数留在原地而夹居在汉人中间的取得了‘猫’姓，声音改变的过程和‘苗’一样……我们是倾向于承认远古的三苗与今日的苗人，乃至瑶人与畬民，是有源流关系的。这样一个带有总结性的初步看法，姑且借此机会提出，将来研究苗瑶由来的问题时，可作参考之用。”

潘先生后来曾否把苗瑶和畬族的由来写成了专论，现在已无法确定了。我凭记忆听说的他的那段设想，似乎比1955年发表的文章更进了一些。我仿佛记得60年代初，潘先生和我曾一起到过罗源、福安等地访问畬族。他对畬族的传说信仰特别感兴趣，因为这种信仰可以从地方志的材料看出它的分布，并推测它的传播路线。如果潘先生的确没有把这个设想写成文章，或是写成了文章无处发表，而在动乱中遗失了，那只有等待后人去补足了。

我在这里想特别提一下的就是潘先生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一向不主张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他在研究了土家和古代的巴人之后，在上述那篇文章里明确地说：

“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终于与汉人完全一样，成了汉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至

少第一步也应该不断地互相参照着进行，才有希望把头绪整理出来，孤立地搞是绝对不行的。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这样一个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在这过程之中，从人文学的方面来看，但也不妨说，这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

我在那次座谈会上称这种是宏观的历史研究。四年过去了，这类的文章我还是很少看见。今天我重读潘先生那篇力作，感慨很深。包括我在内，自叹远远不如前辈。现在，仅就我从这段设想中得出的关于民族研究的一些不成熟意见阐述如下。

正如潘先生所说的，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人们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而且还在发展着。我们对汉族的形成虽则至今还没有科学的说明，但是它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绝不可能是单纯靠汉族的祖先自然繁殖的结果，它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原来不属于汉族的人们而壮大起来的。其他的民族实际上也多是由原来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融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在不断又合又分的过程中出现了我国现有的民族结构。

从这一点认识出发，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发展。从宏观方面发展就是拾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因为他具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而且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他是由许多互相不能分离的民族单位组成的。他是历史的产物，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做出科学的论证。

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向微观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我们在广西大瑶山的研究就属于这个性质。我并没预料到在广西大瑶山的微观研究会在理论上和宏观上与中华民族的研究是统一的。那就是说，在一个民族实体中可以存在若干在语言、生活方

式上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包括了茶山、花篮、坳、盘、山子等5种瑶人。他们尽管各有各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但是都具有瑶人的共同意识。这是和我们中华民族包括着许多不同民族成分相一致的。

我初步的想法，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如果我们对各民族进行细致的深入的微观研究，很可能在许多现在所承认的民族单位里发现同一情形。它们都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成分逐步融合而成的，而且各成分融合的程度又可以不同。理论应当从观察实际的过程中形成，这是我对于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希望。

提高到理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提高民族研究的水平。我觉得过去多少年来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的时期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已不适当当前我国新形势的发展，民族领域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同样适用于民族的范围内。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相等的，有些先进，有些落后。凡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必须向先进民族开放，吸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文化，绝不能维持过去的封闭状态。特别是由于封闭状态所形成的精神上的自我中心和排斥外来的成见。各民族共同繁荣有待于共同走现代化的道路。在这共同道路上，我们固然必须从各民族的特点出发，而且保持民族形式；但是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加深了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在这融合过程中一方面要防止大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地方民族主义，我们正面临这种挑战。我相信，我们各民族一定能过好这一关。民族研究者也有责任在这方面出一份力量，通过科学的论证，向各民族讲清楚这个道理，使各族人民自觉地走上现代化开放的道路。

从回忆起潘先生对畚族历史问题的设想，引起了许多不成熟的想法，提供民族研究者思考。

1985 年 6 月